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25
4 June 1980

CHINESE

第二二二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6月4日星期三下午3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奥尔戈尔德先生（挪威）

理事国：	孟加拉国	拉赫曼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墨西哥	魏克曼先生
	尼日尔	奥马罗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突尼斯	埃萨非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4时会议开始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这是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要代表安理会感谢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伊德·奥马罗先生在担任五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所提供的服务。奥马罗大使在上个月期间以熟练的外交技巧和机智谦恭的态度指导我们的工作，我向他致敬。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1980年5月29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3969)

主席：我要向安理会各理事国报告一下，我收到了莫桑比克和尼日利亚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这个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经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后，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洛博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报告，我收到了1980年6月4日尼日尔、突尼斯和赞比亚代表的一封来信，内容如下：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代表约翰斯顿·

马卡蒂尼先生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会）代表亨利·艾萨克斯先生参加安全理事会对议程项目‘南非问题’的审议。”

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第 S/13981 号文件分发。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约翰斯顿·马卡蒂尼和亨利·艾萨克斯两位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是应 1980 年 5 月 29 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要求召开的，该信已作为 S/13969 号文件分发。

头一位发言人是莫桑比克代表，他要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六月份主席的身分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洛博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我要代表非洲集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的主席表示祝贺。非洲集团确信，在你英明的领导和你的同事们的真心善意的协助下，安全理事会定能果断明确地对南非的爆炸性局势作出反应。

我也要代表非洲集团，对非洲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坐在你们旁边的尼日尔大使伊德·奥马罗先生表示祝贺和致敬，他在五月份期间以明确的态度和智慧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非洲集团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是因为在非洲大陆某地——具体说，就是南非——正逐渐形成令人惊恐的爆炸性局势。局势从今年年初就开始逐步恶化，对你，主席先生，对你同事当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对我们非洲人来说，都很清楚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势。这是生长在我们身体内部的一根刺，过去三十年来我们被迫接受它，这就是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的种族隔离政策。诚然，每一个人都似乎晓得南非的情况，但从事物的发展倾向看来，最近谁都不晓得酝酿着什么样的风暴，也不晓得风暴的规模有多大。我们有予感，由于南非当前的局势，如果不及时采取适当的步骤，极为爆炸性的局面必将出现，现在就是采取这些步骤的时

候了。说到南非当前的爆炸性局势，就是指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每天加诸于南非人民的痛苦、胡乱逮捕、非人待遇、羞辱、压迫和镇压。

南非人民多次试图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改革，但他们得到的却是暴力和蛮横的对待，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挺而走险。他们正被迫采用其他手段去实现他们作人的合法权利，这些手段将使他们能够完全摧毁令人痛恨的种族隔离政策。

最近要求终止校内差别待遇的学生罢课风潮，同1960年沙佩维尔和1976年索韦托发生的和平示威以及南非历史上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不是孤立事件。虽然所有这些抗议都是和平的，但种族主义警察均以武器相向，这种对抗无可避免地会造成大批非武装平民被杀，年轻学生被害。

南非人民争取尊严和人格的长期斗争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仰的，也要求我们提供具体一贯的支持，以便彻底消除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

安理会很清楚，非洲完全支持南非人民争取人类尊严的斗争。非洲对南非问题的立场既不新鲜也不特别。正如右手帮助左手一样，我们是血肉相连的。虽然身体的其他部分可能看来都很健康，但如果有一只脚发生了剧痛，我们也无法不予理会，尽管这只痛脚是在身体的末端。脚痛时，整个身体必须陪着这只痛脚上医院。

我说的身体就是非洲，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带着我们的痛脚来到了安理会，就是想找出一个即时合适的解决办法。

目前非洲的局势是，南非人民已较从前更为坚决地站了起来，去反抗南非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因为他们已了解到，南非目前的情况对他们的事业来说，比从前更为有利。

津巴布韦人民的胜利把南部非洲的解放区延伸到了种族隔离的走廊地带，并加强了支持自由、和平、正义和民主的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

我现在要代表非洲集团向津巴布韦的独立、全非洲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

民的胜利致敬。当津巴布韦人民和该区域其他人民获得了光荣胜利，取得了历史性的独立，全非洲的人民，尤其是南部非洲人民，已成为勇于对任何压迫反覆进行斗争的另一范例。津巴布韦的独立给南部非洲其他人民——即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本已燃起的争取自由和尊严的熊熊斗争烈火，添加了柴草。

我们认为，南非政府本应从津巴布韦发生的一切得到教训，并应把津巴布韦的独立看成是永远无法阻止人民实现他们作为人的合法社会地位的另一明证。

种族隔离政策和通过南非领土的班图斯坦化实现领土分裂的政策，是对南非人民最基本的权利、自由和人格尊严的重大打击。

全世界的人都同意，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因此非洲希望看到南非非法的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政策和行动受到强烈的谴责。国际社会透过充分支持南非人民的真正代表，南非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争取自由的正义斗争，就可消灭种族隔离。

国际社会透过劝阻其他国家不同南非进行任何军事合作或核合作，就可消除非洲的紧张局势，因为上述合作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

最近有许多事例显示，南非政权不仅在对各个邻国发动大规模敌对行动，而且蓄意挑起同它们的防卫部队的武装对抗，有系统地侵犯它们的领空和领土。

非洲在任何非殖民化的过程中从未盲目挑起武装斗争。促成人民反叛的不是别的，就是每一个殖民国家的殖民史。就现在的情形而言，造成南非境内公布的不安和变乱的，就是南非自己。

国际社会可以透过说服种族主义者面对非洲大陆的现实而防止南非局势的爆炸。南非应当接受的一点是：南非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它本身的政策——种族隔离——所造成的结果。我们不能容许南非把内部的冲突输出到各个邻邦去。

鉴于南非的可悲局势，我们认为现在是由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措施以终止南非人民一切痛苦的时候了。我们认为目前的局势令人难以容忍。镇压和恐怖手段

必须停止。大规模不分青红皂白的逮捕必须终止，所有的政治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本人，必须释放。

对于南非所有的种族主义少数集团死硬派来说，整个非洲大陆已经给了他们一个明确无误的简短讯号：不论他们是否同意，在他们有生之年事情是会改变的，就象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所遭遇的一样。

最后，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密切注意南非事态的发展。

主席：我现在请尼日利亚代表也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发言。

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谨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务。我诚挚地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让我有机会参加目前这个关于南非的可悲局势的辩论。前不久我到过风景绮丽的贵国，贵国的人民善良而英勇，对南非发展中的大悲剧深具同情，因此我认为在你高明的指导下举行这个会议，的确意义非凡，你的政治家风度和对自由、正义和民主原则坚守不屈的个人品质，正是贵国的民族特性；在我到达奥斯陆之日，贵国人民正在庆祝结束纳粹占领的三十五周年解放纪念；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会议将给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带来安慰。

自1976年作为历史里程碑的索韦托学生抗暴事件以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成立了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由德兰士瓦的首席法官调查该事件的起因和实际情况。委员会获得的证据和委员会本身的结论显示，南非一千九百万非洲人内心极端不满问题的起因是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法律和作法。

较早以前，在1964年里沃尼亚审判以后，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拉姆齐博士说：

“这些人因进行破坏活动和其他违反现行法律的行为而有罪，但他们是凭着良知行动的，世界各处只要是尊重良知和憎恨种族隔离政策的地方，都会了解曼德拉先生所说：‘我们这个民族多年来受尽白种人的压迫和暴政，我冷静分析局势后才采取行动。’如果说按照现行法律他是有罪的话，在上帝面前有罪的是法律旨在实施的这种政策。种族隔离的构想和做法背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律法，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原是不分肤色的。”

南非悲剧的悲痛之处是该国政府一直知道它快要毁灭的讯号和迹象。但它的反应历来是一样的一粗暴、严厉、消极和缺乏想象力。1960年3月21日发生了沙普斯维尔大屠杀，南非警察残忍对待为通行证法进行和平示威的非洲人，杀害

了69人，杀伤了186人。在大屠杀以后，南非政府迅速着手取缔非洲居民一切民主形式的抗议；禁止一切非洲人的会议。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会）组成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被取缔。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11,000人以上，包括南非人民大会和泛非大会的领导人、被拘留、放逐或监禁。接着是一连串不公平的安全法。1961年的普通法修正案确实剥夺了占共和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非洲居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1969年的恐怖主义法案规定可以无限期地拘留囚犯，使那些将南非政治暴力合法化的严酷法例更加完备。

在索韦托抗暴事件中，南非公安人员杀害了约1,000名非洲学童和平民，杀伤了其他数千人，南非政府的反应是迅速而准确。该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安全取缔。公安部根据各种安全法拘留了约2,430名非洲人，公安部队的人数增至约35,000人，公安部队后备人数相应地增至18,000人，安全法进一步收紧。非洲人到处被禁止活动或被拘留；并且无日无之。南非政府还提出了“国家全面战略”的理论，便利它对前线国家的多次侵袭，干预当时的南罗得西亚英属殖民地，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大量增加国防开支——由七十年代初期的30,000万兰特增至1979年的200,000万兰特以上。

南非的非洲人不准对政府的任何虐待提出抗议；他们只配无声无息地死去，但非洲的学童拒绝无声无息地死去，在过去六个星期，七岁至十八岁的非洲学生走出教室，公开抗议种族隔离的劣等教育，因为它剥夺了他们作为正式公民所应享有的自由和进步的教育，只教导他们如何侍候白种人国民，南非公安人员和军队使用自动武器来攻击他们。许多学童被杀害；也有不少成为终身残废。但这些学童继续抵抗，用石头并且经常徒手还击那些配备了西方技术所能设计的最精密枪支和武器的南非军队。

我希望并且实在盼望安全理事会大胆说出真相，以明确、具体的语言谴责目前南非当局对学童所犯的种种暴行。否则，世界各地有良知的人禁不住要问：国际

关系，甚至人与人的关系竟变得如此残忍无情，以致没有一个政府，甚至安全理事会现在也不真正关怀在官方政策下被杀害或伤残的儿童，为什么以前的博卡萨皇帝杀害非洲儿童这样使人反感，受到普遍的谴责，但白种人在南非杀害非洲儿童却不是如此呢？当儿童在布隆方丹、开普敦和德班的街头赤手空拳地捍卫着自主、正义、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普遍真理，受到配置了核武器、火箭和其他最新型武器的无情的战争机器的蹂躏，安全理事会难道还继续保持缄默吗？我再说一次，1976年在一次类似的抗议事件中，有600多名非洲学童被杀害，为了在南非捍卫人类的尊严和公正，还要牺牲多少人呢？当南非公安部长勒·格朗热先生说，非洲学童若不接受，南非教育培养他们扮演的半奴隶的角色，便只有死路一条。我们难道还要继续保持缄默吗？

昨天，我们听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在两天以前巧妙地互相配合对南非三个主要的石油设施进行袭击。这一事件必然是南非政府最严重的一次挫败，因为它在较早时候在所有重要的设施，包括油库、堤坝、电力站等实施战时安全管制。这一事件想必打击该政府的过份自信。但安全理事会应更关切这一事件对南非白种少数统治和压迫政权的将来的现实意义。

种族隔离的整座大厦现正摇摇欲坠，使它逐渐瓦解的不仅是来自学童的抗暴，普通黑种南非人的政治觉悟正在不断的提高。他反抗这个由占人口百分之十六的白种人操纵国家的全部权力，公开宣称绝不给予二千一百万非洲黑种人国民平等或正义的制度。普通的南非黑人正在思索为何应当满足于在工场过着离开妻小、形同半监禁的生活，一辈子受到通行证的约束，经常吃尽通行证法的苦头。1979年，根据南非的官方统计数字，约有120,000名非洲人因违反通行证法被逮捕。换句话说，每一小时便要逮捕约12名非洲人，因为这些法律规定了他们往返工作或娱乐场所以及住处的全部条件。

帕西·库博扎呼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得到非常热烈的反应。

虽然有许多囚犯在罗本岛被关押十六年以上，但这项呼吁不只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但这项呼吁不分种族地赢得了南非所有知识份子的强烈支持，因为政治变革是必然要出现的。南非必须产生一个新的社会。没有解放运动便没有解放，而解放运动需要有它们的领导人。南非人民大会和泛非大会可以被取缔，但它们的真理和它们所代表的一切却在南非境内发展下去。我想请安理会大力支持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的运动。通过他和象他一类的人，南非可能及时得救。

南非的气氛是危机四伏的。现正收紧通行证法。非洲人发现政治性抗议会招来杀身之祸。南非的白种青年被迫入伍，黑种青年走上街头抵制学校，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报导日益增多。白种公民忘却津巴布韦的教训，正在武装自己。这一切将导致什么情况呢？每年约有15,000名至20,000名南非白种人由于惧怕而移居国外。这些移民以专业人员为主：医生、律师、工程师、建筑师和教师。过多的半熟练工人从欧洲移入南非，使得二千一百万南非人的不满和沮丧有增无已，白种新移民的涌至使南非人得不到训练和就业机会。我曾请国际劳工组织为这个可怕的局面做点事情，协助阻止更多的移民从欧洲和美洲移入南非。

1976年，一个名叫赫克托·彼得森的十三岁大的非洲学童成为索韦托的头一位烈士。我怕第二个索韦托事件正在形成。一个名叫伯纳德·福带恩的十四岁大的“有色”儿童已成为1980年5月新的学生抗暴的烈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亲属可能属于比勒陀利亚政府或同胞联谊会的内层，因为他是波尔人的后裔。南非的青年不再害怕公安人员的警棍或子弹。该国政府完全摸不清历史的方向。它没有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莫桑比克以及最近的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战争汲取以下教训：镇压愈厉害，反抗便愈大，自由斗士的人数便愈多；非洲的解放地区总是不断地扩大，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非洲人要求自由的意志是必然的，这种意志比在法苏达的英国的马克西枪炮要强大得多。

南非教会理事会总干事德蒙·图图主教于1980年5月26日同其他52个主要

的黑种人和白种人传教士一起被捕，因为他们举行和平示威，支持南非的学童。他和他的妻子将于7月1日，即他们结婚二十五周年的一天出庭受审。南非政府于3月吊销了他的护照，因为他拒绝收回他在访问丹麦时所说的话——丹麦政府从南非进口煤实际上帮助维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于不堕。我们都知道他在南非那种袋鼠法庭受审的结果，但他的心境十分平静。正如他所说：“每个人总有一天要决定，究竟要服从人还是服从上帝。”

南非的彼得·博塔总理威胁使用最大的武力，以平息南非的最近骚动。很自然地，他的意思是要对学童、教士和其他看出南非面临不可名状的灾难，忠告南非政府进行克制和改革的其他民间领袖加强残酷镇压。

种族隔离制度是不能改良的。必须加以废止。在过去的五年来，南非花了2,100万美元大力争取西方朋友，影响西方的人们，西方传播媒介受了它的哄骗，大量报导南非的繁荣，象金价上涨、黑种人工资提高等给人以错误印象的统计数字，而南非政府正将经济危险的重担转嫁给黑种人。据估计，城镇内黑种人的失业人数已增至二百万人，不但种族歧视没有停止，种族隔离的哲学也没有任何改变。

因此，学生抗暴同以下种种斗争是相合的：受到残酷镇压的工会斗争；抵制公共汽车加价；反抗非洲市镇加租等等。

1976年和1980年有一个主要的差别，在中间的这段时期内，自由斗士，主要是索韦托的孩子们的活动大大地增加。长期以来拘泥于非暴力的民族解放运动终于决定不能让该政权进行屠杀而免受惩罚。对公安局和其他目标发动多次袭击，其中以1980年6月2日对SASOL油库设施的袭击为最高潮。在沙普斯维尔惨案和索韦托惨案以前，全世界对明显的迹象不予理会，其后则在联合国通过不起作用的决议。全世界这一次总不能再不理睬这个明确的警告，因为前景甚至更暗淡、更严重。

在津巴布韦以后，南非面对一个紧急和无法逃避的选择：和平过渡到多数统治

与和解或者是惨烈的冲突。西方领导人经常认识到南非和南部非洲将发生一场灾难的危险性，但始终犹豫不前，不采取避免这场灾难的有效行动。回顾1977年美国吉米·卡特总统在联合国发出警告说，一场逐渐聚集的种族风暴正在威胁着南部非洲。他保证说美国将通过和平方法努力协助该区域争取多数统治。

南非的局势目前构成一项亟需解决的挑战。联合国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和平解决之道。回顾早在1963年12月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以

“审议关于解决南非当前局势的各种方法：不分种族、肤色或宗教，使整个领土的所有居民充分地、和平地和有序地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第182(1963)号决议）

以瑞典阿尔弗·米尔达尔夫人为首的专家小组提议成立一个充分代表南非的全体人民的真正国民大会，并将释放所有政治犯作为这种大会的必要先决条件。它还表示如果南非拒绝这项建议——南非在1964年真的拒绝了这项建议——联合国

“除了实行经济制裁以外，将没有任何其他有效的和平方法，可协助解决这个局势。”（S/5658，第121段）

很明显地，只有通过有效的国际行动，才能达成这个和平解决办法。但西方国家一直排除这种行动。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唯一具体措施是1977年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但使人吃惊的是，那些坚决答应实施禁运的国家不曾通过有效的法律和其他措施——从而便利各自国家内的公司和私人进行军火走私。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和其他主要的产油国——主要是墨西哥，主席先生，当然还有你伟大的祖国挪威——都决定对南非实施石油禁运。但油船——甚至来自投票赞成大会关于石油禁运的决议的国家的油船——正在秘密地向南非输送石油。南非已能够取得核能力。人们怀疑，究竟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非洲发动战争的大阴谋。

安全理事会必须对南非儿童被杀害表示愤慨，要求世界舆论发挥它的影响力。但这还没有尽到宪章所规定的安全理事会的职责。

安全理事会必须要求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必须要求停止一切压迫；必须要求被压迫人民的真正领袖充分参加决定南非的前途，成立一个基于多数统治的民主政府；必须要求所有国家为此目的发挥它们的影响力；必须要求所有国家严格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停止同该政权的一切核勾结。

它必须要求按照安理会关于南非问题的第421(1977)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紧急地就武器禁运的加强和有效监测提出建议，包括取缔南非输出的所有武器、停止所有在南非制造武器的执照、禁止出售装备给南非军方和公安部，禁止向南非输出所有两用设备、例如雷达。如此一来，英国的普莱西公司、美国的太空研究公司或加利福尼亚州的弗卢尔公司将不会为了赚取肮脏的利润而继续协助屠杀南非的儿童。

安全理事会必须了解到，石油禁运和武器禁运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因此，它应对南非实施石油禁运。目前，它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非法地将石油从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输送到南非，为用来屠杀儿童和侵略邻国的军用车辆和警车提供燃料。尼日利亚预期安理会将作出这样的决定，任何船只、油船或飞机如在其领海或领空被发现违反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南非的石油禁运，将一律予以充公。这些船只、油船或飞机的全体乘务员如被逮捕将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

最后，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响应大会三番五次的呼吁：停止在南非进行新投资、停止同南非进行贸易。

时间已经无多了。对于那些投资在非洲的廉价劳工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享用利润和红利的人来说，立即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时机也许不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解放战争中，他们的投资和资金将首先遭受损失，我们现在正目击这一战争的开始。

有些政府指望南非为它们的战争计划和战略考虑作出贡献，它们看不出在非洲大陆上以南非为它们唯一盟友的任何战争都是输定了的。

也许在这里可以回顾一下南非种族隔离学说的主要理论家亨德里克·维尔伍尔德先生，他是在希特勒的德国接受研究院教育的。沃斯特和博塔都是他的门徒。他们从希特勒处学会上帝如何将南非的白种人封为统治种族。他们从格贝尔斯处学会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伎俩。

南非公然蔑视联合国和国际法院，继续占领纳米比亚。但南非政府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和西方五国进行谈判时，声称它有保护纳米比亚人民反抗西南非民组、保护其他人的神圣义务。南非政府向纳米比亚输出种族隔离，并称之为内政。南非诱骗西方国家购买纳米比亚的铀，将这笔非法的交易美其名为对西方的安全作出贡献。南非假借使南非免受共产主义之害的名义，大举逮捕西南非民组的自由战士。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它最近给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信中，使它的拖延战略显得更荒谬可笑。例如，已故的安哥拉总统内阁曾提议关于非军事区的概念，以求打破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计划的僵局。南非政权对非军事区谈判提出一些新的怪异条件，它妄想联合国同安盟的叛徒集团谈判，又妄想秘书长不承认联合国关于西南非民组的地位和承认西南非民组的决议，作为接受关于纳米比亚计划的条件。我想国际社会现在应当不再同南非玩纳米比亚的游戏了。

不要忘记，沙普斯维尔起义发生于1960年。虽然它是对通行证法的自发性起义；它同二十个非洲国家在同一年赢得独立有着不可漠视的有机关联。后来，1976年发生了索韦托事件。这一事件也是在葡萄牙殖民主义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受到挫败后发生。现在津巴布韦取得了独立。它对南非国内局势的影响是直接、即时和可以预测的。我希望安全理事会不负我们对它的信托——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南非的改革和多数统治指出新方向，因为这也同安全理事会的信用存亡攸关。

主席：我对尼日利亚代表赞扬我国和我个人的话表示感谢。

下一个发言人是亨利·艾萨克斯先生，安理会已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会议。我请他在安理会议事席就座并发言。

艾萨克斯先生：主席先生，我要代表泛非主义者大会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表示祝贺。我们也要对邀请我们参与集中审议南非当前局势的会议表示感谢。

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在选举中获胜，由津巴布韦民选政府接掌政权，在南部非洲拆除了白种优越的又一根支柱，使南非成为白人少数统治在非洲的最后一个堡垒。一家杂志在评论津巴布韦的独立时说：

“这个进程从1960年代英国从其非洲殖民地全部撤离开始，到1970年代随着葡萄牙非洲帝国的崩溃而加速，最后终于完成。南非的450万白人现在孤零零地，成为本来是黑人大陆上最后一个白种优越的堡垒。”

南非黑人抵抗运动的高涨浪潮和非洲次大陆的政治发展——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出现了由拿起武器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并最终击败了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掌权的三个非洲独立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这三个国家都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以及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使南非白人少数统治内外交困。国际压力越来越大，这不仅是由于白人少数顽固拒绝让在人数上几乎是他们六倍的黑人参与该国的决策程序，也是由于白人少数在非法占领的领土纳米比亚问题上顽固地拒不让步造成的。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在南非，内部的、区域的和国际性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1960年，黑人多数响应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会）发动的“实际行动运动”，在三月份，几千名黑人走向该国各地的警察局，以公然反对深恶痛绝的“通行证法”而请警察将他们逮捕，该项法律规定，所有年满16岁以上的非洲人必须随时随身携带一种称为“通行证”的证件。在检查时不能出示此种“通行证”

就会立即遭到逮捕。种族主义警察对于这种非暴力抗议大打出手，杀害了69名非洲人男女及儿童，估计打伤186人。

沙普维尔大屠杀对于南非政权具有深远广泛的后果。

首先，白人政权遭到严重的“信任危机”。“通行证法”暂时废止，一个名叫戴维·普拉特的白人商人刺伤了当时的总理维沃尔德博士；代替受伤的维沃尔德行使总理职务的保罗·索尔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采取了缓和态度，指出旧秩序已经结束。

其次，就黑人而言，南非警察的残暴反应表明了运用非暴力战略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是无济于事的。从此，泛非大会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做为夺取政权的主要斗争形式。

第三，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上，南非政权不断遭到批评和谴责。有一位评论员写道：

“在某些方面来说，沙普维尔大屠杀似乎在南非国境之外有更深刻的影响。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它已成为欧美自由主义者和亚非集团的批评对象，南非政府现在发现它自己更加不得人心。继沙普维尔事件之后，世界股票交易市场引起波动，外国在南非曾一度实际上停止了投资。”

南非在非洲和国际上日趋孤立。沙普维尔大屠杀发生时，南非北面的国家正在摆脱殖民主义剥削和压迫。非洲大陆的独立运动唤起了阿扎尼亚的黑人；另一方面，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在独立后立即倡导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运动。例如，南非被英联邦和无数国际组织开除，主要是非洲新独立国家倡导这个运动的结果。同时，非洲国家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设立的解放委员会向阿扎尼亚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物质援助。

在外国投资者的恐慌影响下，大批资本撤出——仅1960年就有大约4,800万英镑——投资暂时中断，使南非经济濒临崩溃。在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措施对黑人

的反抗进行镇压之后，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稳定”有了新的和显然更大的信心，外国经济势力又涌向种族隔离政权进行投资。以万国宝通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其他银行为首的美国银行财团以极低利率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大批贷款，证明他们对种族隔离政权有信心。

主要是因为南非政权从西方国家得到以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向南非的私营和国营部门提供的经济支持，该政权才能够不仅推行无情镇压阿扎尼亚人民的政策，而且也不受惩罚地蔑视国际舆论和联合国决议。随着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经济投资，每当人们要求对它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时，比勒陀利亚政权都受到外交和政治上的保护。

人们从1976年6月的事件中又可以看出国内、区域和国际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当时南非警察向一群手无寸铁的黑人开火，他们是为抗议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一个决定而集结在一起的，那个决议规定必须用南非荷兰语教授某些课程，而黑人认为这是一种压迫语言。黑人在索韦托起义时如此明显地表现出的这种新的挑战态度，部分是由于兄弟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人民的斗争取得成功而受到鼓舞，这两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最后获得了自由。索韦托大屠杀再一次在白人政权中就种族隔离问题和如何最有效地维持白人优越地位问题引起激烈辩论。而索韦托开枪事件也再一次受到国际上的指责和谴责。但对于阿扎尼亚大众来说，或许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关于武装斗争是否为推翻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唯一正当手段的辩论，终于告一结束。

自1976年6月索韦托起义以来，阿扎尼亚黑人反抗斗争浪潮日益高涨，政治审判数量的增多便是一个旁证。政治审判问题是格伦·莫斯所研究的主题，他在《南非的政治审判：1976 - 1979年》一书中指出：

“……1976年以来出现了大量新的政治审判，使投入南非政治监狱的人数比自1960年代初期臭名昭著的审判以来任何相对时期关押的人数都要多。”

审判提出的证据充分证明莫斯结论的正确性，他认为，由于统治阶级试图维持它的稳固地位，使冲突充满了整个南非社会，只有对社会的所有方面进行彻底重新改组，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本原因，目前这种冲突已相当于小型内战。莫斯的原话如下：

“……在索韦托黑人青年1976年6月发起反抗之后，构成南非社会基础的冲突，其级别和激烈程度已经大为增加。从冲突的性质及其数量上的规模看来，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冲突。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暂时畸变，或某种偶然变化。肯定地说，冲突构成了南非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统治阶级试图维持和再现这种社会，而冲突本身也就得到维持和再现。换句话说，只有对南非社会进行彻底改组——包括改组经济，统治集团的政治结构和作法，意识形态的文化——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目前这种冲突已相当于小型内战。”

从南非当前的冲突中可以看出莫斯结论的正确，在南非到处是镇压的情况下，黑人学生一直站在反抗种族隔离的最前线，并且能够惊人地长期坚持他们的反抗斗争。

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竭力通过严刑峻法对黑人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实行监禁和拘留，以镇压对其种族政策的反抗，黑人反抗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斗争在过去一个月中更加激烈。在过去10天中，黑人学生的罢课斗争升级，抗议当局向黑人提供的劣等教育制度。在德班也发生了纺织业工人的罢工事件，开普省西部肉食品工业的黑人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在5月26日星期一，发生了黑人牧师和白人牧师的示威游行，其结果是53人以违反“禁止暴动性集会法”为名遭到逮捕和指控。

学生罢课是今年4月开始的，西开普省的所谓“有色”学生拒绝上课，以抗议为黑人提供的劣等教育制度。虽然某些课程教学必须使用南非荷兰语的规定在1976年6月16日索韦托暴乱之后已予废除，但是，黑人和白人教育两方面的政府开支悬殊，黑人教师和白人教师薪水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黑人学校的教室也拥挤不堪。

几所英语大学的所谓非洲人学生和印度人学生以及白人学生也加入了有色学生的斗争行列。在几天时间内，罢课斗争遍及该国其他地区，不久便席卷德兰士瓦、克瓦祖鲁班图斯坦、奥兰治自由邦和东开普省地区。1980年5月14日，在东开普省的伊丽莎白港，9名武装人员试图劝说抗议学生返回教室，一名人员被学生用石头打死。

1980年5月21日星期三，在南非荷兰人腹地的首府布隆方丹附近的Batho镇和Manguang镇，警察向抗议的黑人人群开枪射击。在警察的枪击下，一名男人被打死，两名妇女被打伤。1980年5月24日，警察凶暴地驱散在开普敦的两个超级市场门前举行静坐示威的大约3,000名黑人学生。

新闻媒介有意缩小阿扎尼亚黑人最近反抗浪潮的范围和激烈程度。不断造成的印象是，罢工罢课浪潮渐趋消失，这要归功于彼德·博塔总理采取的让步态度。然而，所显示出的证据表明，动乱正在不断升级。

学生罢课之外，西开普省和纳塔尔的工人又罢工了。西开普省肉食品工业的黑人工人在800名工人因为支持其他黑人工人而举行罢工被开除之后，自1980年5月21日星期三起一直进行罢工。纺织工业的1,500名工人自5月22日星期四起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了罢工。由于这两个工业的工人组织了工会，两个行业的罢工都有可能发展成全国性罢工。

1980年5月26日，南非警察逮捕了53人，其中20人是牧师，包括约翰内斯堡圣公会大主教蒂姆·贝文牧师和助理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牧师。牧师们是为抗议拘留表示支持学生活动的另一位教士而进行示威的。所有这些牧师都面临按照1976年全国起义以后颁布的所谓“禁止暴动性集会法”而进行的指控。

博塔政权的反应是实行有系统的镇压，包括下禁令、流放和拘留不予审判。在过去几个星期，已有成百名学生和社区领导人遭到拘禁，其中有：阿扎尼亚人民组

织前主席柯蒂斯·恩康多(Curtis Nkondo)先生,他在获释后还被判5年禁止活动;前罗本岛政治犯艾奇美特·卡西姆先生,他是教员,现居开普省,受到限制活动的处分;特内沃·温泽尔先生,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成员;迈可·塞吉维克先生,教会城市规划委员会成员;艾德纳·万·哈特女士,为黑人开办的西开普省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格威尔教授,为黑人开办的西开普省大学南非荷兰语教授;尼维尔·阿历山大博士,前罗本岛囚犯,目前就职于高等教育南非委员会;特里萨·所罗门女士,前罗本岛囚犯马科斯·所罗门妻子;约翰尼·伊塞尔,南非学生组织前领导人,西开普省社区领导人;隆美尔·罗勃兹,开普省西部区社区领导人。该国各地还有成百名学生遭到拘禁。

黑人领导人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和恩塔多·莫特拉纳博士对黑人社区内的紧张情况表示了他们的关心,并警告有重新发生1976年和1977年震撼全国的暴乱的危险,但很清楚的是,政府并不准备听取这些由人民大众选出的可信赖的黑人领袖提出的警告。

最后,泛非主义者大会表示赞同尼日利亚克拉克大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要求;特别是,首先,安全理事会应要求无条件释放阿扎尼亚的所有政治犯;其次,安全理事会应严肃考虑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强制性经济制裁。有人认为,必须同比勒陀利亚保持经济联系,因为这是影响该政权的最好方法。在这方面,我们要对这些人的论点予以驳斥。这种论点的荒谬可从1960年到1970年间的事实看出。在这段时间内,南非经济空前增长,但同时镇压也相当加强,那段期间大约通过了94个新法律,包括用于镇压该政权黑人反对者的所谓“恐怖主义法”和各种其他法律。必须保持和加强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外交上完全孤立该政权的运动。

最后,我们要明确表明,我们充分认识到,争取解放的任务必须由被压迫人民自己来承担;我们在这个任务面前从未退缩过,将来也绝不会退缩。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国际社会有义务支持阿扎尼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我们的人民正在与之斗争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是对人类的犯罪。

下午5点10分散会